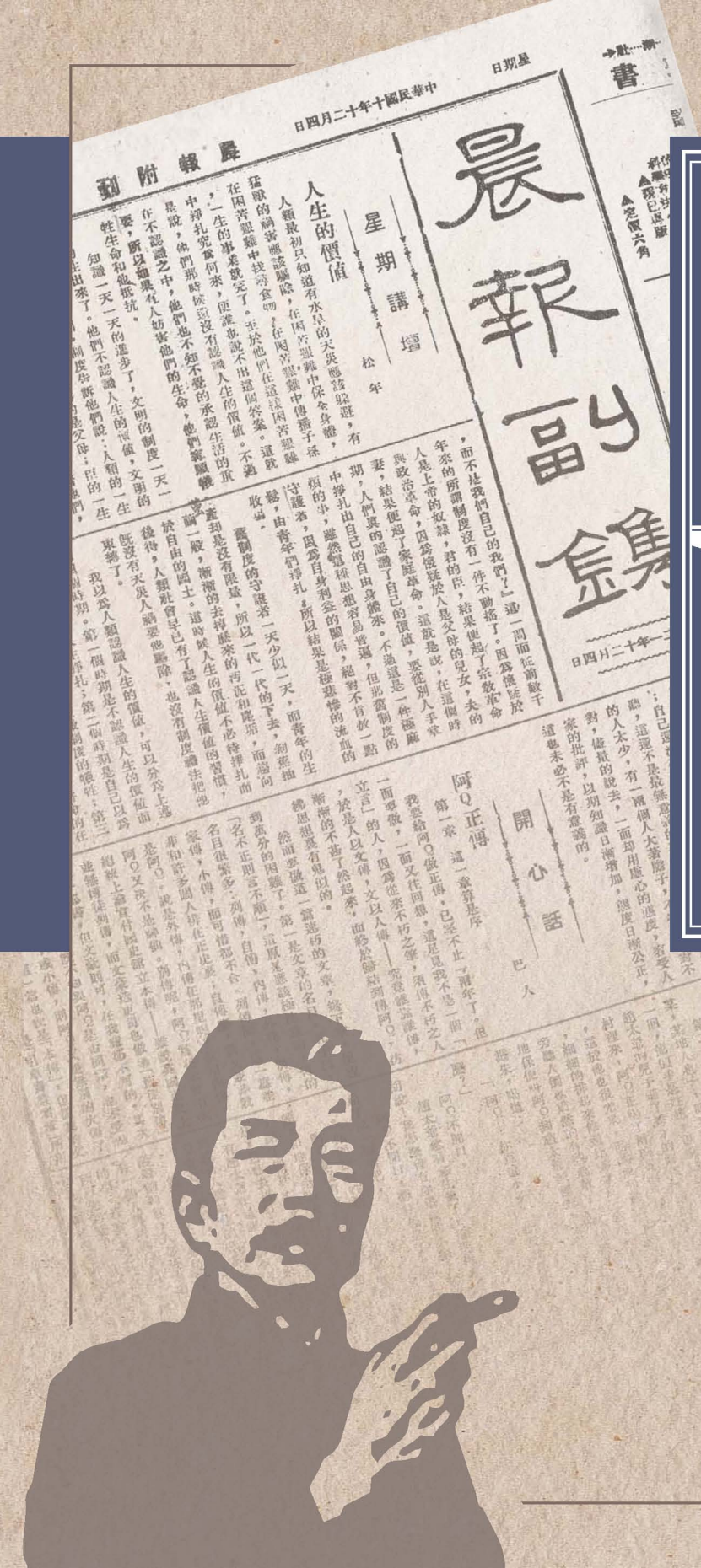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

廖华力 著



蘭州大學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南宁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资助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

廖华力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壮乡学人的“天纹之页”

张民华

廖华力博士的专著《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以下简称《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是一部兼具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现代新闻传播史研究双重意义的最新学术成果。这位壮乡学人的研究成果宛若一幅精心织就的“天纹之页”（壮锦的壮文 mbaw laiz fax 的本意）。其研究彰显了作者跨专业研究的“杂交”优势，其成果见证了作者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值得肯定与褒奖。

我以为，华力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其成功之道在于他选对了一个“切入点”，用足了一番“苦功夫”，步入了一方“新场域”，寻到了一把“总钥匙”，打开了一座“藏宝洞”。

路的“切入”

华力以《晨报》副刊为研究切入点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这得益于他对萧乾关于“以刊登创作为主的文学副刊，是中国在世界新闻史上一个特有的贡献”观点的心领神会及相应的前期准备。实事求是地讲，他执意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择的这一研究报纸副刊与文学关系的“新入口”，经历了前些年的熙来攘往，早已成了一条“老巷子”。但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切入”恰到好处。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已成为他对副刊研究领域的一个“特有的贡献”。

曹聚仁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就是近现代的新闻史。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发展史与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建树颇多的贤达，又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新闻发展进程中关键节点与重要史实的见证人与亲历者，曹聚仁的论点是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与近现代新闻传播的历史渊源上讲的，这种渊源又总是与大众传媒的律动息息相关。

华力闯进的这条“老巷子”可以说既远又长。而且，近年来这条“老巷子”的访客已是纷至沓来，但华力却能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生生将这条“老巷子”变成了一条“快速路”。其学术成果已成为曹聚仁观点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论据与带有示范效应的案例。

毋庸讳言，关于周氏兄弟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有关《晨报》副刊的学术成果已屡见不鲜。而解码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探究亦不胜枚举。意欲在累累硕果的“夹缝”中突围，是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与破茧功力。这部30余万字的《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显现了华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术勇气，也证实了他“板凳肯坐十年冷”的治学功力。

在兰州大学完成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硕连读之后，华力在学业上选择了一次转场——在兰州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学位。其选修方向是“媒介与二十世纪文学”。心仪已久且有备而来的他做出了一个抉择，首先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新闻传播史上同时占有卓越地位并发挥独特作用的《晨报》副刊确立为主攻目标，进而选定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为切入点。这个点恰似几何学中两个相切圆共有的唯一切点。于是，他通过传媒——这个具有同构性的“切点”——穿越了从新闻传播学直抵文学的最短距离，叩响了自己跨专业的博士阶段的学术之门。当时，陈思和关于“以现代报纸副刊与新文学的关系而言，《晨报副刊》是一个最为典型的研究个案”的论断，帮助他进一步坚定了攻坚克难的信念。于是，他从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关系的视角破题立项，独辟蹊径地把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作为一个具有同构性与共生态的整体，并置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具体

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下，刻苦钻研，缜密考察，破解了从追寻原报原刊到确认作者笔名等一道道关隘，掌握了大量与周氏兄弟文学活动及《晨报》副刊发展进程有关的第一手资料，并在去伪存真与去粗取精中，稳扎稳打地形成自己的定见。

正所谓“文如其人”，《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架构与行文亦如作者一样，文风质朴，语言平实，不事张扬。但在质朴中显现出坚毅，平实里蕴含着真诚。通篇绝少“惊人之语”，却在不动声色中为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封，揭示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那个传者与传媒“同构”与“共生”的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与现实意义。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相同的或相似的系统结构叫作事物的同构性。文学活动中的不同门类、不同体系、不同界别、不同范畴、不同功能的诸元在价值追求、文化理念、创作实践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要素、行为，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一个新的合体，或者在双方融合、双向映射及相互作用中，彼此同时成为对方的有机部分或生成互动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同构性或同构关系。

共生亦称互利共生，是表明两种生物能够彼此互利地生存在一起，而任何一方缺失就会导致双方皆不能生存的一类“种间关系”或“生存形态”。所以说，共生形态是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高级形态。共生的生物在生理上相互分工，互换生命活动的产物，双方在组织上形成了新的结构。

华力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了双方关系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同构性与共生态，并对从原报原刊中整理勘验出来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加以审慎辨识、缜密论断，其学术品格及研究成果难能可贵。

“行”的执着

作为一名出身寒门又远赴陇原负笈求知的壮乡学子，华力在读本科与硕士期间甘于箪食瓢饮中专心致志、好学力行，并得以在硕士毕业当年的跨专业考博时一举中鹄。但他选定的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研究，却面临需要海量阅读但难以就近找到原报原刊的窘境。令人欣慰的是，华

力并没有退缩，他选择了知难而进、负重前行。为了不受时空限制地随时随地查阅原报原刊，以准确无误地了解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历史全貌。他在妻子与同窗好友的资助下，义无反顾地筹措了9000元钱，自费购买了一套完整的《晨报》副刊影印本。后来又节衣缩食，购买了《鲁迅全集》与《周作人自编文集》及相关人物的传记、专著及工具书等。为了筹措购置相关的专著与资料的款项，读博期间，他三次放弃假期参加高考阅卷，以兼职所得略补少米之炊。虽然囊中羞涩，但他在购置所需的参考资料与学术专著时却从未有过半点迟疑与吝惜。读博期间，他仅购书一项的花费就将近两万元。

执着于不避寒暑地“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华力反复对照影印本和周氏兄弟的原著、书信与日记，厘清归纳并逐一确认了鲁迅、周作人、李大钊、孙伏园、蒲伯英等《晨报》副刊作者的笔名与作品篇目，梳理了他们之间从业共事的脉络，还对周氏兄弟在《新青年》与《晨报》副刊所发作品的数量、体裁做了全面的考证与论述。他为了确认鲁迅《我的失恋》被撤稿的具体日期与替代篇目所做的研究与考证是枯燥而辛苦的，但所得出的结论是有价值的，是理应得到赞许与肯定的。

华力为周氏兄弟在《晨报》副刊上原创或转载的作品列出的两份完整而准确的目录详单，见证了他读博之路的执着与坚忍。为了这两份目录详单，他除了反复查阅手头的《晨报》副刊影印本，更参考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对《晨报》副刊的发展历程与周氏兄弟的创作实情做了扎实而详尽的考证与辨析，并据此认定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之间确已形成“同构”与“共生”的关系，并在相互成全中实现了双赢。

我以为，华力梳理出的周氏兄弟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及译作的详单，真实而完整地再现了周氏兄弟在《晨报》副刊为人、为文的全貌与详情。以往有关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的研究大都只谈到周氏兄弟的作品数量，而很少对这些作品的刊发周期与频次做定量分析。这就往往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感觉盛名之下的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数量似乎不够多，对比周作人显得相形见绌。但华力的清单却打破了这种成见，让人耳目一新：

> 从鲁迅的作品详单可以看出，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包括译作与转载）总数达55件，分为137天刊出。其中从1921年4月21日到1924年10月31日这1290天里，《晨报》副刊相继刊发鲁迅作品53件。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多日连载的，最长的连载天数多达20天。详单显示，鲁迅这53件作品是分133天刊载的，平均9.6天刊出一次。在这53件作品中，署名鲁迅的27件是分97次刊出的，占刊出日期总数的70%。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晨报》副刊平均13.2天就会刊出一次署名鲁迅的作品。这一署名情况表明，鲁迅是把《晨报》副刊视为自己文学活动新的主场的。

华力整理的作品详单，是周氏兄弟从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期刊”（《新青年》）转入“第一副刊”（《晨报》副刊）的路线图，是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同构”映射关系的晴雨表，还是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共生”态势的“心电图”。所以，它又是一份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大事年表。透过它能够捕捉到兄弟二人与《晨报》副刊关系由远向近、又从亲到疏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

1924年10月31日的《晨报》副刊，最后一次刊发了鲁迅的译作《苦闷的象征》。同一天还刊发了孙伏园辞职的启事。耐人寻味的是，已经连载了20天的《苦闷的象征》并未登完竟于当天戛然而止。加上此前周作人《徐文长的故事》中途撤稿，两次“腰斩”无情地宣告了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相互成全的“蜜月”的终结，同时也预告了《晨报》副刊鼎盛时期的“衰歇”。

华力这一成果，为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的论述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确凿论据和令人信服的数据支撑。

“场”的辨识

1922年1月至10月，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开了一个名为《自己的园地》的专栏，他在发刊词里写道：

> 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范围就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有本了他个人的自觉，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

《自己的园地》专栏的开设，从一个侧面表明，随着新文化运动落潮及五四精英群体的分化，在“办刊物”与“推文艺”方面一路同行的周氏兄弟，在被迫从《新青年》退场后，此时已经确定将《晨报》副刊作为自己笔耕的新园地。随后，他们又与一批执同业的“行动者”一道，将《晨报》副刊改造成了“为人生文学”新的栖息地与“引导国民精神”新的用武之地。

华力的研究引导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周氏兄弟的登堂入室，才使得这个新的栖息之地与用武之地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并成为那一特定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北方堡垒”。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同构”与“共生”的几年中，这个中国“第一副刊”成了当时文化精英的聚集地、文艺探索的策源地、众创模式的出生地与新作迭出的集散地。

大量的史料与研究成果显示，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始终是与传媒息息相关。他们在“推文艺”的求索史程中，总是一以贯之地把探寻、创办传媒当成文学活动中的“紧要事”和“第一步”。而且他们的文学活动对传媒的倚重不仅是自觉的、自为的，而且是有的放矢并与时俱进的。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就曾追述自己自弃医从文伊始就把创办刊物作为“推文艺”之“第一步”的心路历程，并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文学观与新闻观：

>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

在与《晨报》副刊诀别数月后，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大声疾呼：

>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

灯火。……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不难看出，“总想多办几个刊物”的鲁迅，其持之以恒的“第一要著”的初心不移，但让他魂牵梦绕的“紧要事”，已经从最初的“出杂志”升华为开辟“新文场”。这表明了鲁迅对传媒认知的与时俱进。

华力从周氏兄弟追寻“园地”“文苑”“文场”的史程中辨识出周氏兄弟文学理念与传媒认知的与时俱进，并确定用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学说作为自己此次研究的理论支撑与批判武器。他给出了自己的“文学场”定义，是指参与文学活动或与之相关的“社会行动者”，“依托现代传媒”开展自创与众创等“类型多样的文学活动的一个场域空间”。

毫无疑问，华力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得益于他的由此及彼、相得益彰的专业背景及学术根底。这种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使他得以另辟蹊径地运用自己相对熟悉的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知识、学术素养与研究方法，来审视传媒在内容生产（特别是文学活动）中以往常常被忽略的角色、地位与作用。他着力梳理了当时的新兴传媒（重点是改版上升期的《晨报》副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存在方式、重要节点、人文背景与制约条件，剖析和论证了传媒对重要作家的文学活动及其重要作品的创作流程及传播方式等所起的策动、组织、调控、传播等不可或缺的作用。至此，华力跳出了“文学活动四要素”理论的束缚，并从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中找出了传媒作为“文学活动第五要素”的多项实证与可信论据。

研读华力的文本，我们可能会对传媒在包括文学活动中在场诸元的地位与作用有新的理解：文学活动中传媒既是作品的传播工具与物质载体，又是参与文学活动的“行动者”执事从业的多维空间与共生场域。

鲁迅把改造国民精神视为比强身健体更紧要的“第一要著”的观点与《晨报》的精神领袖梁启超及总编辑蒲伯英、副刊主编孙伏园等人的观点是相当接近的。这也可以视作周氏兄弟认同《晨报》副刊办刊理念的重要依据之一。华力的研究关注到大众传媒特别是报纸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不容置疑的特殊地位与独特作用。他从周氏兄弟执着追寻的历程中，从《晨报》副刊改版后的多个成功案例的辨析及数据比较中认识到，副刊

既是一个具有传播功能的介质或物件，更是一个新闻产制与文学活动相关要素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场域。只有那些与时俱进的传媒才有可能成为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心目中的“崭新文场”。

华力在这一专著的个案研究中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判断：

> 鲁迅在与《晨报》副刊“同构”与“共生”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大多是在《晨报》副刊的邀约之下进行的。没有《晨报》副刊的积极约稿，也不会有鲁迅这些短篇小说精品的诞生。《晨报》副刊在鲁迅短篇小说的诞生方面起着“孵化”与催生的重要作用。鲁迅应《晨报》副刊约稿而创作的这些短篇小说，在主题思想、情节内容、艺术形式等多方面都深深地打上《晨报》副刊的烙印。《晨报》副刊以自己的传媒特色影响鲁迅短篇小说的基本存在风貌，并为鲁迅短篇小说的经典化起到初步的塑造作用。因为《晨报》副刊的存在，鲁迅作为优秀小说家的声名才得以愈加的隆盛与彰显。鲁迅的短篇小说不但构成《晨报》副刊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晨报》副刊吸引更多的读者、形成更大的刊物影响力与传播力贡献了力量。

“人”的发现

毫无疑问，找到“金钥匙”的华力如愿闯进了一座“藏宝洞”。这洞里珍藏着中国报纸副刊的开山之作——《晨报》副刊及由其推出的《阿Q正传》《不周山》《自己的园地》《美文》等传世佳作，这里更聚集了与《晨报》副刊结下不解之缘的梁启超、李大钊、蒲伯英、鲁迅、周作人、孙伏园、徐志摩、冰心等众多名声显赫的报界名家与文坛大师……

华力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他既关注“物”但更关注“人”。他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研究中找到的“总钥匙”就是“文学即人学”。这让我们目睹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个力证：周氏兄弟与蒲伯英、孙伏园等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同道合之人，不仅是以《晨报》副刊为纽带的新文场上“凶猛的勇将”，而且是双方实现“同构”与“共生”的众创行动的“参与者”与相互成全的“行动者”。

1918年12月，周作人著《人的文学》，将停留在文字改良、文学改良层面的运动，引入对人的“生存境地”的思考:“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与周作人重视“文内之人”的“生存境地”相映成趣的是，鲁迅同时对“办刊之人”与“为文之人”的“生存境地”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在《呐喊·自序》中就谈到“推文艺”“办杂志”既要“寻到几个同志”，还要“邀约了必须的几个人”。在《域外小说集·序》中他更是把“同志”列为兴文艺、办刊物的五大要素之一。

追寻华力的论证轨迹可以看出，其视野既关注了“文内之人”的“生存境地”，更重点关注了“为文之人”特别是“几个同志”与“必须的几个人”的“生存境地”。

关于“文学是人学”，我国著名学者钱谷融早在60年前就做出了精辟的阐释：

> 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一意见的正确。

我以为，华力的研究中是找到了这样一把“总钥匙”的。他在研究中注意到周氏兄弟在《新青年》、《晨报》副刊这两个场域风云际会的前后两批“行动者”之间相谐共振的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如鲁迅就认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议论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么看重”。对于《新青年》时期曾是“同一战线的伙伴”，又是引荐周氏兄弟到《晨报》第七版并转载过自己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的李大钊，鲁迅还直言不讳地强调双方“所执的业，彼此不同”。而周作人则对《晨报》副刊特别是总编辑蒲伯英与孙

伏园总是不吝认同与赞誉之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周氏兄弟之所以能够与《晨报》副刊实现“同构”与“共生”，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晨报》副刊才是一个看重创作并且集合了一批志趣相同、执业相同的“行动者”的“新文场”。

华力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中梳理了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相依相生、互动互补、相得益彰、相互成全的历史情境，特别是论证了决定并促成这种“同构”与“共生”局面并发挥决定与主导作用的，是包括周氏兄弟、蒲伯英、孙伏园等一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新闻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活生生的“行动者”。正是靠着这“几个同志”与“必须的几个人”的频繁而热络的认同互信、文化交流与业务互动，才在五四新文学盛况不再的“衰歇”期，坚守了“传播新文化、发展新文学”屈指可数的一方阵地，开创了《晨报》副刊的一个群贤毕至、佳作频出的鼎盛时期，联手打造了“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

华力凭借着这把“总钥匙”打开了“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的大门，梳理并论证了周氏兄弟与蒲伯英、孙伏园等“必须的几个人”一起“众创”《晨报》副刊及《开心话》《新文艺》《自己的园地》等知名栏目的外因与内因。并第一次提出：《阿Q正传》是由作者、编者与业者“共创”而成的文学经典。

被誉为中国20世纪文学经典的《阿Q正传》堪称传者与传媒“同构”与“共生”中众创精品力作的经典案例。以往的鲁迅研究者或《晨报》副刊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孙伏园对《阿Q正传》创作的作用，但多把他定位为一位有能力的编辑，一位善于联络并能够从鲁迅手里拿到作品的“催稿人”。

华力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者关于孙伏园成功催生《阿Q正传》这一结论的局限。他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既发现了这一“催稿”背后的来龙去脉与文创机制，更查证并论述了蒲伯英在《阿Q正传》创作与发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与特殊贡献。以充分的史料和缜密的考证，从蒲伯英提议开设《开心话》栏目，到孙伏园请鲁迅为专栏供稿，并直接提出阿Q这个鲁迅曾经给他讲过的线索，到鲁迅根据专栏的定向需求写作的来龙去脉，向我们揭示了这篇名著的运作流程与众创模式，论证了行家主

事、专家主编、大家主创这三个环节实为《阿Q正传》创作成功缺一不可的维度与要素。昭示“同志”与“必须的几个人”的合力“共创”，才是《阿Q正传》成功的主因。

《阿Q正传》的运作流程显示出传媒在内容生产（这里主要是文学创作）中的支配地位、选择权力与引导作用，也彰显《晨报》副刊在聚集作家队伍、发现优质资源、精确制导写作、激活创作活动、营造宽松氛围的制胜之道与成功密码。

在蒲伯英、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的鼎盛时期所形成的这种业者、编者与作者的和谐“同构”，正是通过鲁迅所说的“必须的几个人”的主动参与、角色互补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实现的。应当说，这一论断是对“文学是人学”说的新的补益与丰富。换言之，说文学是人学，既要讲文学是塑造人的，更要讲文学是人塑造的，是业者、编者与作者（包括译者）这“必须的几个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而以传媒为平台，“必须的几个人”通过同构相谐，共同建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晨报》副刊模式，为传媒是文学活动“第五要素”的论点提供了新的诠释与佐证。

副刊是中国报刊的四大要件之一，也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传媒平台。处于鼎盛时期的《晨报》副刊与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现代作家的成功互动，无论是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在现代文学史上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存在。从华力的专著中我们看到，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不仅是《晨报》副刊的撰稿人，更是其改版及创业的参与者。而中国报纸副刊这一专业概念的得名也应归功于鲁迅、蒲伯英与孙伏园的相得益彰。孙伏园在《五十年前副刊回忆》一文中曾记录下《晨报副刊》版面上所呈现的这种“必须的几个人”同构相谐的实情：

> ……这个小报的名称，便有了三种写法。一种是鲁迅先生的原文《晨报附刊》，小报的四个报眉上便如此；一种是蒲（伯英）先生的报头《晨报副镌》。还有一种是在两种中各取一字作为《晨报副刊》。这第三种中的‘副刊’两个字以后便成了同类刊物的通名。

由此足见，集中了鲁迅、蒲伯英与孙伏园三人智慧，于1921年10月12日问世的《晨报附刊》（《晨报副镌》）及后来渐成报界通名的副刊，确是

一种业者、编者与作者“同构”映射的报界新品，一些“必须的人”众创共生的传媒佳作。

这种业者、编者与作者的同构相谐与众创共生的前提是志同道合与同气相求，但它也会因人而异、时迁事异。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李大钊、孙伏园及徐志摩三任主编同构相谐程度的差异与变异，其创作活动与《晨报》副刊的依存度的变化，以及彼此关系的远近亲疏都与认知的偏转及人事的异动息息相关。

通过梳理与辨识，华力发现传媒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发现作为“第五要素”的传媒在与其他要素交互中的联动性与能动性。他从周氏兄弟有关文学活动与传媒的论述，从他们关于人的支配地位和特殊作用的表述，从他们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中发现，在文学活动乃至内容生产中真正居于支配地位并起串联作用，影响到“同构”程度与“共生”走向的核心与关键是活跃其中的“必须的几个人”。也只有这些人才是帮助我们厘清文学活动诸要素关系，辨识诸要素地位与作用的“密钥”。置身于“同构”与“共生”中的每一个“必须的人”都是文学活动乃至内容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而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就是一种“文场”上以“同构”与“共生”形态维系的“生产关系”。而在这种“同构”与“共生”的诸要素中起决定性与支配作用的是人，即鲁迅强调的“行动者”“同志”与“必须的几个人”。只有这些人才是文学活动乃至内容生产中最活跃的要素。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让我们洞悉了一个事实：文学活动中的诸要素，无不打着与生俱来的人的标记与行动的烙印，体现着人的能动性与选择权。正是由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行动者”，不仅成就了自身的生产力与创造力，也决定并影响着与其他要素的关系，而各个要素的关系也是由“行动者”在“同构”与“共生”中成就的。而决定彼此“同构”与“共生”发展进程的是“行动者”的能力素质、行动认知及关系选择。这不仅是我们理解鲁迅关于“执业不同”的“新钥匙”，更是我们辨识传者与传媒“同构”与“共生”现象的“总钥匙”。从华力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晨报》副刊的功成名就是如此，《开心话》的如鱼得水也是如此，《阿Q正传》的合力众创更是如此。而周氏兄弟对文学新人的扶持及与读者

的互动等也概莫能外。

“业”的无垠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是华力从不舍跬步的习者向传道授业的师者华丽转身的一个拐点，也是他由兰大学子跻身壮乡学人的一级阶梯。但学无止境业无垠，战斗正未有穷期。这本专著还只是他学术攻关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其主攻的“场域”与“行动者”关系研究仍存在一些有待拓展与继续开掘的“未尽事宜”。

首先，关于传者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这两个关键词，仍有进一步精确正名释义及对指向的史实做解析与阐释的必要。而《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本身，亦有继续挖掘史料、梳理脉络并做出理论探究的可能与必要。

其次，传者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是需要条件与机遇的。这种“同构”与“共生”又是因人而异、随场而变、情易势转、时移事迁的。《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阶段性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一论断既需要做更多微观、断代、个案与具象的辨识，也需要做更多宏观、长程、总体与抽象的论证。

再次，作为本研究主要对象的周氏兄弟是一个整体。专著的前部较好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周氏兄弟初涉文学阶段与《新青年》时期的研究中做了相应的梳理与论述。但对《晨报》副刊时期的研究则较多地做了一分为二的处理，希望论者能够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整体化研究中，通过对兄弟间行动观瞻异同的比较，做些既有各展其长又有交集互动的辨析与适当的补强。

最后，传者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究竟是一种带有共性或普遍性的常态，还是一种只表现为个性或特殊性的异动？这也是《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研究引出并需要继续探究的一个新议题。

无论是继续穿越“老巷子”或是夺取“新关隘”，都对论者的理论积累及知识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华力在这一方面仍须锲而不舍，继续深耕。

而《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部分章节或多或少显露的“述多论少”或“述强论弱”的问题，也需要在书稿的修订及后续的研究中努力完善。这也是他从学子走向学人必须完成的“蝶变”！

“皎皎白苎白且鲜，将作春衣称少年。”这是唐人张籍的《白苎歌》中的两句。据一位广西的朋友讲，诗中的白苎就是早期的壮锦品类之一。张籍在诗中表达了对白苎布的赞美，称赞身着白苎布衣服之人会显得更为年轻。

作为华力的博士生导师，我恳望风华正茂的他能够采撷文场上崭新的“天纹之页”，织就比《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更新、更出彩的“春衣”。我也愿借用鲁迅的两句诗来收束本文，并送上我对他的期待：“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兰州大学萃英学者、特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引　言　“文学场”视域中的周氏兄弟 ……1

第一章　“文学场”的探寻路径还原 ……19

第一节　“第一要著”与出师未捷的《新生》 ……20
第二节　《新青年》：求索史程的“第一期刊” ……26

第二章　“第一副刊”：周氏兄弟的“新文场” ……54

第一节　“新文学在北方的堡垒” ……55
第二节　“行家当家”的蒲伯英 ……58
第三节　“关系异样”的梁启超 ……66
第四节　不甘“衰歇”的文学革命 ……83

第三章　“同构”与“共生”的多维映射 ……100

第一节　同声相和的“几个同志” ……101
第二节　耀眼夺目的文学呈现 ……11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